

“满洲根本”：清代中期驻防旗人的 满语能力与满文官学教育

王 刚

摘 要：清代驻防旗人的满语能力因族群、地域的不同而存有一定差异。最迟至雍正年间，南方京口、福州、广州三地的汉军旗人已基本无熟练掌握满语者。乾隆初年，南北各地满洲、蒙古旗人满语能力的急剧衰退成为普遍状况。乾隆中后期，在绝大多数驻防地区，日常熟练使用满语者所剩无几。清初的八旗驻防点大多未曾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乾隆二十年（1755）之后，各驻防地普遍兴建满文官学，并由驻防官员严加督查，大力强化满语文教学。然而，几乎所有的八旗驻防点均处于汉文化的强势包围之中，满语等旧俗并不具备长期保持的条件，官方创办的满文教育实际收效甚微。

关键词：八旗驻防 满语 官学 旗人

满语、满文在清代称作“清语”“清文”，统治者长期视之为“满洲根本（manju i fulehe da）”^①、“我朝根本”^②，严令旗人勤加学习。清中期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是驻防旗人满语能力加速退化以至基本丧失的关键时段。乾隆年间，清廷为应对八旗驻防体制出现的危机，在军制、财政、文教等领域采取了多项革新举措。大力兴建满文官学，强化满语文教育，即是其中文教方面的重要措施。

清代八旗文教的既有研究成果，集中于旗人参与科举文武场及翻译科等领域，^③对驻防旗人的满语文教育所涉不多。张杰介绍了康雍乾三朝东北地区八旗学校的基本状况。^④金鑫以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为基本史料，对康熙朝黑龙江八旗官学的数量、师资、教学内容进行了探讨。^⑤马子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以下简称满文录副奏折），盛京将军恒禄奏报辽阳牛庄城驻防官员军政考核并兵丁骑射技艺情形折，乾隆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档号：03-0184-2387-010。《乌鲁木齐都统明亮奏查看乌鲁木齐军营官兵训练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4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1096，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甲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册，第701页。

③ 王丽：《清代翻译科述论》，《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潘洪钢：《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江汉论坛》2006年第6期；何宇：《试论清代科举中的翻译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王日根、章广：《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考试研究》2015年第5期；章广：《功名的“代价”：八旗科举与满洲旧俗的转变论析》，《满族研究》2018年第4期；王凯旋：《清代“国语骑射”与八旗科举》，《辽宁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刘谦、陈颖军：《清代科举制度与满族文化的互构》，《江汉论坛》2019年第8期；陈尚敏：《清代驻防八旗科举述论》，《历史档案》2021年第3期。

④ 张杰：《清前期东北地区的满文学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

⑤ 金鑫：《康熙朝黑龙江八旗官学教育释疑》，《满族研究》2012年第3期。

木考察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清廷允许驻防旗人参加翻译科考试后各地的满语文教育状况。^①而清代中期各地八旗官学的设立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究。此外，清代满语文的日渐式微早已是学界人所共知的史事，^②本文不拟对此问题再作重复性的全面介绍，主要利用相关满汉文档案，将着重针对前人关注较少的各地旗人满语能力的具体差异及丧失时间的先后、清代中期八旗驻防官办满文教育的普遍推行等若干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一 清中期驻防旗人满语能力的演变实态

在各类旗人群体中，汉军旗人的满语能力最早退化及丧失。汉军的先祖入旗之前，生活方式、语言文字与普通汉人并无二致。入旗后，虽有部分人“满洲化”，但大多数汉军旗人的母语仍是汉语，满语能力远远不及满洲旗人。汉军学习与使用满语，主要是为了与满洲旗人进行交流，故而在京师及西安、绥远城等满洲、汉军共同屯驻地区，汉军旗人的满语水平尚能勉强维持。乾隆十一年（1746），广州副都统马瑞图奏称：“奴才向在西安，西安汉军与满洲同驻一城，延师甚易。至于当差行走，俱在一处，习见习闻，耳音既熟，上口即得，故西安汉军之清语较易于他省。”^③而当时的广州驻防仅设汉军，缺乏与满洲旗人沟通、学习的机会。为此，马瑞图提议从西安等地调派熟谙满语者来粤充当教习。

南方京口（今江苏镇江）、福州、广州三处驻防点起初由汉军单独驻扎，当地旗人的满语能力早早地陷入了衰退。雍正年间，京口汉军官兵的满语水平即已甚为低下，虽由官方督促学习，但“驻防年久，未免舌硬，一时未能即会”^④。乾隆初年，据当局调查，总人数2万余名的“京口八旗内能清话者”，竟然只有“正白旗骁骑校王朋一人”^⑤。

乾隆五年，署理福州将军策楞奏称，福州八旗“兵丁习气亦皆疏懒，且驻防日久，生长闽地，能说清话者十无二三”^⑥。当地的满文官学“学生内翻译、编话、写字三项，粗谙文理者尚不乏人，求其纯熟通晓者，寥寥无几”^⑦。驻防官员的满语水平也相当堪忧，“各旗员中，除履历之外，能清话者仅止一二人”^⑧。

清初，广州驻防“向来八旗各设学堂一所，挑其稍习清话者为学长，教习清话”。而至乾隆初年，当地的满语教育早已名存实亡，汉军官兵遇将军用满语查问时，“其履历尚能勉强声说，再以

① 马子木：《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

② 参见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季永海：《满族转用汉语的历程与特点》，《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季永海：《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上）》，《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季永海：《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下）》，《满语研究》2005年第1期；郭孟秀：《略论满语濒危过程》，《满语研究》2007年第2期；刘彦臣：《清代“国语骑射”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于家富：《清乾隆朝强化“国语”法律保护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陈力：《清朝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下称朱批奏折），广州左翼副都统马瑞图奏为敬陈选派年力尚壮清文清语熟练者来粤专司教习兵丁之责未议事，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01-0133-038。

④ 《镇海将军王貳奏明办理喂养京口马匹事宜折》，雍正九年九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

⑤ 朱批奏折，镇海将军王貳奏为京口八旗清话学堂微有成效请设教习清书外郎以免废弛事，乾隆三年二月初四日，档号：04-01-01-0025-021。

⑥ 朱批奏折，署理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策楞奏为到任查察驻防旗营军装器械等大概情形并陆续酌办缘由事，乾隆五年四月十五日，档号：04-01-16-0011-039。

⑦ 朱批奏折，福州将军新柱奏请定官学赏给银数并分别情形奖罚生员事，乾隆八年九月初三日，档号：04-01-38-0181-014。

⑧ 朱批奏折，署理福州将军策楞奏为现在办理旗营事务事，乾隆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档号：04-01-01-0053-035。

他事询及，即不能登答”^①。甚至连负有引导与表率之责的“旗员及满洲官学教习，与以讲论，多有间杂土音，言韵不正。推原其故，缘八旗驻防日久，音声习染，以讹传讹，殊多舛谬”^②。

满洲、蒙古旗人的满语能力原本强于汉军，但雍正以降，也逐渐陷于衰颓之中。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南巡至杭州，曾检阅当地八旗驻军，见“满洲、汉军官兵皆善骑射，娴熟满话”^③。而至乾隆初年，景况已大不相同，据当地驻防将领奏称，“因兵丁于杭州驻防年久，讲说汉话，语调皆沾染本地汉音”，“今兵丁仅有能将各自数句履历诉说者”^④。这些旗人基本丧失了使用满语交流的能力。

乾隆中叶，满洲、蒙古旗人满语能力的急剧衰退已成为南北各地的普遍情况，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开始频繁出现相关记载。如南方荆州满蒙旗人“因于外省地方驻防年久，旧人亡故后，兵丁清语较之先前，渐至颓废”^⑤。江宁（今南京）驻防满蒙旗人对于满语亦是“熟习者少，生疏者多”^⑥。北方青州驻防满洲官兵“清语欠缺者多”^⑦。山海关及周边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喜峰口等处驻防“官员内清语生疏者多，兵丁能讲清语者颇为罕见”^⑧。天津水师营满蒙旗人已沦落至“武艺平常，甚至不能清语、乘骑”的地步^⑨。即使是在地处塞北边疆、原本受汉文化影响较小的宁夏（今银川）驻防，满蒙旗人也是“不能讲清话者甚多”^⑩。

清代中期旗人满语能力的严重退化，并不仅见于直省驻防八旗。在旗人聚居的京师，甚至是旗人数量居多的东北地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乾隆七年，乾隆帝发现京师南苑“侍卫官员、兵丁俱说汉话”^⑪，震惊之余，立即加以申斥，此事也折射出当时京师旗人使用汉语的普遍程度。东北盛京被清廷视作“龙兴之地”，汉人的流入长期受到限制。但至清代中期，东北旗人的满语等旧俗，仍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不再似清初那样“淳朴”。乾隆十年时，乾隆帝曾在谕旨中大加褒扬：“盛京乃根本重地，向来满洲风俗淳朴，居家崇尚节俭，清语及马步射无不娴熟，从无纷华靡丽之习。”^⑫然而，这绝非当时盛京地区的实情。

清代各地八旗驻防官员在奏报所辖官兵的满语状况时，往往使用“多”“大半”“甚多”等较为模糊的词语。盛京地区的部分官员则在奏折中以相对清晰的数据展示了掌握满语者的数量与比例，史料价值颇高，也使后人得以窥见当地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的具体过程。乾隆三年，盛京副都统哲库讷奏称：“奉天地方之兵丁习气颓废，马箭生疏者甚多。满洲、蒙古兵丁懂得清语者仅一半，汉军

① 朱批奏折，广州将军阿尔赛奏请于学堂慎选外郎教习清话随同办事等事，乾隆二年八月初二日，档号：04-01-38-0180-036。

② 朱批奏折，广州将军锡特库奏为操演驻广八旗员弁甲兵营伍情形并拣员教习汉军清话事，乾隆十年十月初一日，档号：04-01-18-0005-029。

③ 《清圣祖实录》卷192，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丙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册，第1040页。

④ 满文录副奏折，杭州将军傅森奏报遵旨训练兵丁并教习清语改当地土音折，乾隆七年六月十二日，档号：03-0171-0304-004。

⑤ 满文录副奏折，荆州左翼副都统德齐保奏准各牛录设立官学教习幼丁闲散骑射满文折，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档号：03-0178-1822-021。

⑥ 满文录副奏折，江宁左翼副都统萨图奏请于江宁地方设立八旗满学折，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档号：03-0178-1815-039。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满文朱批奏折（以下称满文朱批奏折），青州将军色尔图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档号：04-02-002-000365-0042。

⑧ 满文朱批奏折，山海关副都统富当阿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档号：04-02-002-000499-0016。

⑨ 《清高宗实录》卷782，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乙未，第10册，第611页。

⑩ 满文录副奏折，宁夏将军舍图肯奏校阅宁夏官兵技艺并使养育兵闲散子弟勤学满语折，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档号：03-0176-1633-017。

⑪ 《清高宗实录》卷173，乾隆七年八月戊申，第3册，第213页。

⑫ 《清高宗实录》卷236，乾隆十年三月乙酉，第4册，第45页。

仅有寥寥数人懂得。”^① 乾隆二十一年，熊岳城副都统佟海视察得知，所辖熊岳城、复州、金州、岫岩、盖州、旅顺水师营等地兵丁共 4100 余名，其中“满洲、锡伯、巴尔虎三千一百余兵丁内，除原本懂得清话之近一千名兵丁外，全然不晓清话者，此间勤加教导，约略能讲、将眼前之语学说之兵一千五百余，又年老、甚染汉俗之兵五百余”。此时懂得满语者不足三分之一，能够熟练掌握之人所占比例自然更低。至于“汉军近一千一百名兵丁”^②，则早已完全不会满语，官方甚至没有对其进行认真教导与考核的计划。乾隆三十九年，盛京将军弘晌对下辖各地进行巡查。他“自抚顺起，至兴京、凤凰城、岫岩、南金州、复州、熊岳、盖州、牛庄、辽阳等城，旺清、碱厂、暖阳、凤凰城等边门及水师营查看”，所到之处，兵丁“清语娴熟者罕见，粗略能讲说者尚有，全然不晓清语者多”^③。官兵满语能力较之近 20 年前佟海的报告又有明显降低，能够熟练使用满语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已基本弃用满语。乾隆中后期，虽然清廷及盛京地区官员一再强调“清语者，满洲之旧俗，盛京乃众满洲根本之地，非他省可比”^④，但对于当地旗人满语能力普遍丧失的状况，也只能徒呼奈何。

清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内，旗人满语能力的衰退与丧失是整体性的总趋势。只是由于各个地区旗人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一，旗、民交往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故而各地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的时间有先后之别。就地域而言，南方各省八旗驻防地区旗人的满语能力是最早衰退与丧失的，北方各省八旗驻防地区与京师次之，东北、新疆等边疆驻防地区再次之。至嘉道年间，京师、畿辅与直省驻防旗人早已在日常生活中采用汉语，满语反倒成为一种陌生的语言，需要通过专门的教育来学习，完全不懂满语者也大有人在。但这一时期，黑龙江等偏远地区的旗人仍能熟练使用满语，甚至“多有不识汉字、不通汉语者”^⑤。直到今天，尚有少量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满语、锡伯语的人群生活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边疆地区。这表明，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的速度，取决于他们与汉人交往的广度与深度。

二 八旗驻防官办满文教育的出现

清初，各地八旗驻防突出其军事机构的定位，大多未曾设立官学、学堂、书院等专门的教育设施。旗人以当兵披甲及进行军事训练为日常主要活动，罕有正式的文化教育。“各省城驻防兵子弟教授满洲语言文字、拉弓射箭、典章伦理，皆听其自便，并无设立官学教育者。”^⑥ 自雍正年间起，由于各地旗人满语水平渐趋衰颓，在清廷的督促与指导下，满文官学等教育机构开始陆续设立。

福州驻防在汉军出旗之前，于雍正六年（1728）设立官学一所，教授官兵满语文。“以协领一员、笔帖式一员每月专司考课，并稽察勤惰。又于四旗内长于清话、清书领催、马兵中，每旗各挑一名，共总学长四名，为之教习。每旗各挑壮丁三十名，四旗共一百二十名，在学肄业。又于一百

① 满文录副奏折，盛京副都统哲库纳奏请奉天府等地兵丁教习清语骑射等事折，乾隆三年六月十二日，档号：03-0171-0300-0041。

② 满文录副奏折，熊岳副都统佟海奏熊岳地方满汉兵丁提高技艺学习满语折，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档号：03-0176-1597-023。

③ 满文录副奏折，盛京将军弘晌奏查看盛京所属各城军队训练情形折，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档号：03-0186-2576-032。

④ 满文录副奏折，盛京将军弘晌奏查盛京库储银两器械及官兵技艺语言等情折，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初五日，档号：03-0186-2547-015。

⑤ 《钦差都统哈琅阿奏报续调吉黑兵全数进关并请留倭克精额等在关带兵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5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95 页。

⑥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为议复请设满蒙学馆教育兵丁子弟事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郭美兰译：《乾隆朝绥远城设立八旗官学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2 年第 2 期。

二十名内，择其清话、清书学习稍优者，挑设梅楞大二十名，每名分管五人，日司课读。”^①雍正八年，福州驻防四旗又“各立学房一所，在各该旗官兵子弟内挑取教习，遇有官学生缺出，即于各该旗学房内挑送验补”^②。

这一时期，福州汉军旗人的满语水平已十分低下，“官兵驻闽年久，清书、清话日就生疏”。满文官学与学房设立后，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管理与考核章程，但实际情况并无改观。“递年以来，学房肄业诸生虽亦知奋勉向上，但求其翻译明白通畅者，竟不可多得。推原其故，教习之员大率皆本驻防之人，翻译平常，是以造就人材因循，不能进益。”因本地缺乏合格的满语教习人员，乾隆十五年，福州将军新柱奏请从京师调拨教习，“于候补、候选旗员内拣选翻译精通之笔帖式，赏发一员来闽，专司教习。六年年满，照例回京，教有成效，另请议叙”^③。

雍正年间的京口驻防汉军旗人基本丧失了满语能力。乾隆三年，驻防当局试图对此状况加以改变。经过调查，当时的京口旗营仅有正白旗骁骑校王朋一人“能清话”，当局以他为教习，“随择可以造就之资挑选十数人，令其教导学习，此中有明敏熟练者，又令其在八旗各设学堂，辗转教导”。其后，陆续建起“学堂十数处，其间能清话者几近数百名”。按照京口将军王钺的说法，这些学生“虽其音韵未能悉臻尽善，而寻常问答之语，考询俱能应对，不似止学履历数句，以供一时之酬应而已”。王钺还奏请扩大满语教学的规模，于“京口八旗每旗各设官学一处，每处设外郎一名，即送现今熟练清语者充当，姓名咨部存案，令其教训后学清话之兵壮人等”^④。不过，京口汉军旗人的满语能力实在太低，几乎是从零起点开始进行教学，连教习人员自身都不能熟练掌握满语，成效可想而知。况且，京口地区旗、民杂居，相互交流频繁的大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仅仅通过简单的学校教育，根本不足以遏制满语在日常生活中渐遭废弃的趋势。

绥远城八旗驻防设立于乾隆初年，由京师调来的“包衣内选择之兵”组成。这些兵丁“作为另户来此驻防，通晓满蒙语言者寥寥无几”。为此，绥远城将军补熙等人于乾隆六年奏请设立满蒙翻译官学，“将空房拨给两翼各一处，作为学馆。其教学之巴克什，敕交吏部，由蒙古旗因公犯事革免之杂职官员内，拣选精通满蒙语言文字者两名，按翼委派，作为巴克什”^⑤。乾隆帝令军机大臣对此复议，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虽同意设立满蒙官学的做法，但认为“由京城选派人员教学，彼等必然不顾兵丁之能力可否，一律召集施教，亦与省城之例不合”，只允许就近“由该城及右卫领催、披甲内，拣选通晓满蒙语言文字者教学”^⑥。

清代专门面向旗人设立的翻译考试，包括满汉翻译与满蒙翻译两大类，其中前者为主流。绥远城驻防自设立满蒙官学后，当地旗人多参加满蒙翻译，满汉翻译反倒被忽视。绥远城地处口外，文化教育水平较为落后，驻防八旗内“不仅不得能翻译满汉文之人，即便包括官员之子弟及兵丁，略通汉文堪以教学者，亦难寻觅”。乾隆十一年，绥远城驻防当局举行满汉翻译考试，以选取笔帖式，但“经分析阅看，方选得三份考卷，不过粗译而已，语言文字并不流畅确切，此皆系未学汉文之故”。此后不久，将军补熙即奏请“照本城设立蒙古学之例”，设立满汉翻译官学。教习人员方面，

① 朱批奏折，福州将军新柱奏请定官学赏给银数并分别情形奖罚生员事，乾隆八年九月初三日，档号：04-01-38-0181-014。

② (清)新柱等：《福州驻防志》卷9《官学》，《故宫珍本丛刊》第33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③ 朱批奏折，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新柱奏为福州四旗官兵清书清话日就生疏请敕部拣选翻译来闽等事，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档号：04-01-12-0077-038。

④ 朱批奏折，镇海将军王钺奏为京口八旗清话学堂微有成效请设教习清书外郎以免废弛事，乾隆三年二月初四日，档号：04-01-01-0025-021。

⑤ 《绥远城将军补熙等为请仍照原奏设立满蒙学馆教育兵丁子弟事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初六日，郭美兰译：《乾隆朝绥远城设立八旗官学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⑥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为议复请设满蒙学馆教育兵丁子弟事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郭美兰译：《乾隆朝绥远城设立八旗官学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因当地“无人能教满汉文翻译，相应从京城八旗因公犯事革免、降调官员内，由部酌情挑选翻译满汉文优秀者，每翼各派一名，为师教学”。^①

乾隆初年，热河八旗驻防“选能教导之兵丁十二名，于热河、喀喇河屯、桦榆沟三地设立六所满学，教育闲散幼丁清书、清语”。乾隆十二年，热河副都统纳兰保又提出，“满洲、蒙古各有根本，蒙古闲散幼丁若仅学清书、清语，年久之后，其蒙古根本（monggo i fulehe da）将至废弃”^②，因此还在学校中对蒙古旗人增加了蒙古语的教学。

三 乾隆中后期满文官学的普遍设立

雍正年间至乾隆前期，部分八旗驻防地开始新设满文官学，但这一时期各地的满学大多规模较小，且数量有限。至乾隆二十年后，无论关内关外、南方北方，各驻防地开始普遍设立满文官学、学房等教育机构。出现这种状况，既缘于各地旗人满语水平大多在此阶段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客观上有加以挽救的需求，也与乾隆帝本人大力提倡“满洲旧俗”、严厉督促旗人强化满语的统治思路密切相关。

荆州驻防于康熙中期设立后，“八旗五十六佐领，每佐领设一学校，由兵丁内通晓清语之人选出一名，教导闲散等人清书、清话”。但这种设立于基层的“学校（tacikū）”并非八旗官方统一管理的“官学”，规模很小，管理松散，“并无对教习示以劝惩之例”，在满语教育上的实际作用颇为有限。乾隆二十五年，因驻防旗人满语日渐废弛，荆州副都统德齐保奏请增添教习人员，除原有的56名教习在各佐领继续保留外，另于“满洲、蒙古十旗领催、前锋内”挑选满语熟练者，每旗一名，“赏九品顶戴，照旧食其领催、前锋之钱粮，作为各旗之总教习（dalaha tacibukū），教导闲散幼丁等清书、清话、马步箭之法”。在教学内容方面，荆州将军“嵩椿到任后，于训练官兵空闲，将《御制清文鉴》内紧要者逐条择出五六千言，另订一卷，交付协领、佐领等官，以至兵丁、闲散幼丁，皆教之朗读记诵”。^③

除增设教习人员外，荆州驻防还陆续新建了若干满文官学。乾隆四十五年，在各旗建“满汉官义学”一所。同治年间，设立层级更高的“八旗翻译义学”一所，从各旗义学中挑选学生三四名，并“延本驻防精通翻译之举人、生员二名，教习翻译”。此外，还有“八旗两翼满汉义学”2所，每所义学有学生二三十名不等，从各佐领中选出。^④这样，荆州驻防就形成了从最基层的佐领（56所），至更高层级的旗（10所）、翼（2所），以及驻防整体（1所）的各级满文官学体系。

西安驻防的满语教育起初与荆州类似，也是由佐领等基层组织选派教习人员，对旗人进行较为松散的教导。康熙年间，西安将军博济为使“年长者渐渐亡故后，满洲旧俗不至废弃”，下令“每佐领挑选披甲等人，教导闲散幼丁”^⑤。此后，西安驻防“每佐领、甲喇皆设一所学校，由各旗、佐

① 《绥远城将军补照为设立满汉翻译学以便选取笔帖式事奏折》，乾隆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郭美兰译：《乾隆朝绥远城设立八旗官学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② 满文录副奏折，热河副都统纳兰保奏将热河银库移入副都统衙内以便看守并设立蒙古学房教习蒙古语折，乾隆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档号：03-0172-0788-014。

③ 满文录副奏折，荆州左翼副都统德齐保奏准各牛录设立官学教习幼丁闲散骑射满文折，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档号：03-0178-1822-021。荆州驻防满洲、蒙古各有八旗，旗人分属十六旗。在各旗的管理上，满洲八旗每旗各设协领（gūsai da）一员统领，蒙古八旗因人口较少，总共仅设两名协领，满蒙旗合计设十名协领。故而在当地官方用语中，又有“满洲、蒙古十旗”（manju monggo juwan gūsa）之称。

④ （清）希元等：《荆州驻防八旗志》卷7《学校志》，《续修四库全书》第8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页。

⑤ 满文录副奏折，西安汉军副都统林泰奏请八旗设立满学并报西安地方雪情折，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档号：03-0178-1813-008。

领之领催、披甲内选出一人，教导闲散等”。但这种教育模式逐渐暴露出较大弊端，教习之职只是临时充任，并非专差，被挑选的兵丁往往敷衍塞责，使相关教学流于形式。乾隆二十五年，西安驻防将临时挑选的教习人员改为专职的教官。满洲、蒙古旗“每佐领仍旧设一名教官（tacikūi da）教导”，汉军旗教官较少，仅于“每旗建二所学校，设二名教官”，并未普及至佐领一级。此外，“若汉军旗不得能教导清文之人，即于满洲、蒙古旗内挑选并令其教导。管束闲散等人时，每学校派领催一名协管”^①。

乾隆初年，成都八旗驻防“设立两处官学，定额二百官学生，选马兵中通晓满汉文者，作为教习”。乾隆四十八年，又将已有官学按八旗均分，“一学校内分为四座，共八座，每旗择四十人，共定额三百二十名学生”。新增官学生120名，“每人每月赏银八钱，用于读书时衣履等项”，所需经费自“牧厂地租银”内开支。^②

福州汉军自乾隆十九年起全体出旗，改驻满洲旗人。旗营内原设的“清书官学”一所继续保留，“额定学生一百二十名，选派品行端方、长于翻译之领催、甲兵等教习清文并教演骑射。每年额支银二百四十两，每学生一名月给纸笔费银一钱，余银以为薪水、茶炭之资及考试、奖赏之用”。道光二年，因附学人数过多，“学舍拥挤，教习不能周到”，遂“于八旗十六佐领下各添设清书学堂一所，每佐领定以学生二十名，共三百二十名，俱选派领催、甲兵等一体教习清文、骑射”。^③

广州驻防汉军于乾隆二十年之后出旗一半，由新调来的京师满洲旗人补缺。乾隆三十七年，经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旗营“两翼各设学房一处，于八旗前锋、领催中挑选能教清话者数人，分拨两学认真教习，仍令学叙清文稿案，专派协领大员督率稽查，将军、副都统间月考校一次”^④。新建的学房被称为“两翼清书总官学”，各有学生20名，经费为每月膏火银8两、茶水银1两5钱。除左、右翼清书总官学外，广州驻防还有层级较低的“八旗清书官学”。每旗各设1处，共8处，“于本旗内挑选能清语者为教习，本旗子弟悉令入塾学习清文，由本管协领遴委章京一员督率稽查”。驻防当局每月各拨给茶水银4钱作为经费。^⑤

乾隆年间，江宁驻防也有规模较小的满文学校，起初缺乏专门房舍，“于旗营之祠庙空闲房屋内教者多”。乾隆三十七年，清廷下令将“各省驻防地协领所兼任之佐领空出官房”用作公用，江宁驻防以此类空房96间“作为各旗官学房屋”^⑥，才使得满文官学有了固定的处所。

乾隆二十八年，山海关副都统富当阿奏请在所辖大小八处驻防点设立满文官学，于山海关领催、披甲内“选能教导清语、清文者六人，设立三学校，喜峰口、永平府等七地，每地选二人，设立一学校教导”^⑦，共新设官学10所。

东北锦州“八旗学生读书时，并无官学房屋，皆租祠庙之房作为学舍”。乾隆四十二年，当地裁汰2名笔帖式，将其遗留的“六间官房作为八旗官学房屋”^⑧。

① 满文录副奏折，西安将军松阿哩等奏报西安八旗各设学校教官训导官兵折，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档号：03-0178-1813-008。

② 满文录副奏折，成都将军特成额奏报成都养育兵动用正项及从地租银中增拨八旗官学费用折，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档号：03-0190-2978-029。

③ 朱批奏折，福州将军萨秉阿奏为福州满营原给养贍银数不敷请拨马价银两发商生息并添给各佐领下清书学生膏火纸笔事，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七日，档号：04-01-01-0737-060。

④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李侍尧奏为查阅过八旗官兵办理清书学房事，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档号：04-01-16-0055-069。

⑤ （清）长善等：《驻粤八旗志》卷3《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859册，第701页。

⑥ 满文录副奏折，署理江宁将军印务两江总督高晋奏请将江宁协领兼佐领之空房用于官学折，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档号：03-0185-2466-017。

⑦ 满文朱批奏折，山海关副都统富当阿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档号：04-02-002-000499-0016

⑧ 满文朱批奏折，锦州副都统德福奏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档号：04-02-002-000658-0049。

绥远城满蒙翻译官学与满汉翻译官学于乾隆初年设立后，因规模较小，仅能各容纳学生 20 名，仍有大量“八旗闲散幼丁，虽各自备资斧学习，然力所不及，未得以学习者亦众”。乾隆三十七年，绥远城将军容保奏请裁撤旧的翻译官学，以“现有校舍两处，并留用请圣恩腾出之协领、佐领房屋两处，及嗣后再出之官房一处”^①，新设八旗满洲官学 5 所，主要教授满文、满语，不再强调翻译。当时绥远城满蒙旗人的满语能力已相当低下，5 所满洲官学“每学现有学生百余名，徒有其名而已，并未得以好好学习，于学生甚无益处，反被耽误”。此外，“自裁汰翻译学以来，考取笔帖式及撰拟咨行各地汉字文稿，日渐难以得人”。乾隆五十年，绥远城将军集福奏称，其上任以来，“整修将军衙门内房屋十五间，将八旗近三百名俊秀子弟编为五所学校，挑选贤能教习，每日教授满洲语言及马步箭”。他建议将原有的 5 所满洲官学全部裁撤，“仅留一处校舍，仍照旧例作为满汉翻译学，考取两名翻译教习，挑选八旗俊秀稍大子弟三十名，教授满汉文翻译”。^②此外，将军衙署内新建的 5 所专授满语的学校继续保留。

乾隆四十五年，根据凉州副都统博成的提议，“凉州左、右两翼，每翼设一学校，庄浪八旗，设一学校”^③，教授驻防旗人满语。满文官学以两城裁汰官员遗留之房屋为校舍，每所学校“由兵丁内考取熟练清语三四人，授为教习，以训年幼闲散余丁，三年期满，咨部升用。其膏火、纸笔之费，由铺房租内拨给”^④。

清廷平定天山南北后，自乾隆二十九年，陆续抽调凉州、庄浪、热河等地满蒙八旗官兵至伊犁驻防。这些旗人在原驻地区已与汉人长年交往，满语能力大为丧失。因此，伊犁驻防当局也强化满文教育，“每旗各设一所满学（manju tacikū），择教习教导八旗闲散幼丁”。此外，“将各地行往伊犁之汉文译为清文，清文译为汉文，亦必需通晓之人”，故而“另设学校，择教习等教导”，专门教授满汉翻译。与内地驻防不同的是，伊犁地区民族众多，“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回子等混居，且有与哈萨克等贸易、照看使者等项，通晓蒙古语文后，学哈萨克、回子之语文又略为容易”^⑤，故而当局在八旗官学中还特别强调对蒙古语的教学。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间，清廷在各驻防地积极推行满文教育，对于汉文教育的开展则有诸多限制，一些驻防地新设学校的提议曾遭到否决。青州将军额尔图于乾隆十一年奏请“青州亦照京师设立义学（jurgangga tacikū）之例，八旗设四座义学堂，于兵丁内人诚实、通晓文字者，每学选二名作为教习，教导闲散幼丁”^⑥。但军机大臣讷亲等认为，京旗“大臣、章京又另有兼办之事，不能遍教，是以八旗官学之外，又设立义学教导。各省旗人皆计旗建造官房，居于一处，该管将军、大臣、官员除将其教育之事外，无另应办理之事。故前京师设立义学时，各省并未设立。今若为文字而设学校教导，各省旧教育之道则以之为托词，反至疏忽怠玩”^⑦。额尔图所奏遂遭驳回。

清廷反对各地驻防推广汉文教育的重要原因，在于防止旗人沾染汉俗，丧失满洲本业。直至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去世后，这一状况才逐步改变。当年，清廷首次准许驻防旗人就近参加科举

① 《绥远城将军容保为设立满蒙八旗学五所支給教习及学生银两钱文事奏折》，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郭美兰译：《乾隆朝绥远城设立八旗官学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② 《绥远城将军集福等为请改设满汉翻译学并设学训练八旗子弟事奏折》，乾隆五十年九月二十二日，郭美兰译：《乾隆朝绥远城设立八旗官学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③ 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大臣福隆安奏议准予凉州庄浪设立八旗官学教授兵丁及闲散子弟国语折，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档号：03-0188-2834-003。

④ 《清高宗实录》卷1109，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癸酉，第14册，第834页。

⑤ 《署伊犁将军永贵奏伊犁开设八旗官学教习满洲蒙古文折》，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93册，第82-83页。

⑥ 满文录副奏折，青州将军额尔图奏请于青州设立官学教育八旗子弟折，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档号：03-0172-0798-001。

⑦ 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大臣讷亲奏额尔图所请于青州设立官学教育八旗子弟之处毋庸议折，乾隆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档号：03-0172-0798-002。

院试，不必远赴京师应考。嘉庆二十一年，又允许驻防生员在各省参加乡试，并定额取中。此后，驻防旗人学习诗文、参加科举之风日盛，驻防官方与民间为此新建了各类汉文书院、学堂。如西安“八旗始公设清汉义馆，延师教导诗文，所有各佐领下教读系官兵捐办，清汉义馆束脩系在房租项下开销”^①。广州驻防为教育八旗童生，“满汉各创设义学，延民籍学行兼优之儒为师，肄业生童无定额”。此类满汉义学实际上主要教授汉文科举知识，与满文、满语关系不大。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帝令驻防旗人停止参加文科举，改应翻译考试。广州驻防随即设立“清书义学”，“择八旗优于翻译者二人为教习”。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重新允许驻防旗人参加文科举，各地的汉文教育再度兴盛。同治四年（1865），广州将军瑞麟新建八旗义学一所，后改称明达书院。^②至此，绝大多数地区的驻防旗人早已不再于日常生活中使用满语，原有的满文官学虽继续开办，但基本失去了现实价值。

结语

清代驻防旗人的满语能力因族群、地域的不同而有一定差异，相对而言，汉军逊于满洲、蒙古旗人，南方驻防逊于北方驻防。最迟至雍正年间，南方京口、福州、广州三地的汉军旗人已基本无熟练掌握满语者。乾隆中后期，包括“根本重地”盛京在内的绝大多数驻防地区，在日常生活中熟练使用满语者寥寥无几。乾隆二十年之后，各驻防地普遍兴建满文官学，并由驻防官员严加督查，大力强化满语文教育。此现象的出现，既缘于各地旗人的满语能力确有加以挽救的需求，同时也与乾隆帝本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推崇“满洲旧俗”，强化满汉畛域的统治策略有直接关系。

尽管当局试图扭转旗人旧俗逐渐丧失的趋势，但实际收效甚微。从根本上说，几乎所有的八旗驻防点均处于数量占绝对优势，文化也更为发达的汉人的包围之中，满语等旧俗并不具备长期保持的条件，其衰退只是时间问题。此外，八旗驻防的首要任务是军事镇戍，缺乏大兴教育的基本条件。清代各驻防地刊刻满文书籍者，仅有顺治年间江宁的“听松楼”和清末的荆州、盛京，中间几百年竟一无所见，^③足见文化领域的落后程度。各地驻防当局兴办满文官学，大多仅是遵奉皇帝训令的应景之举。满文官学招收学生数量有限，教导之人自身的满语水平也相当低下，实际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况且，单单通过课堂教学，也不可能让旗人熟练掌握已在日常生活中被边缘化的语言。到同治、光绪年间，除个别边疆地区外，汉语已成为绝大多数旗人的母语，满语则基本在日常交流中消失，仅在缮写公文、官方仪式等场合使用，清廷对于驻防旗人所谓“国语骑射”旧俗的恢复也不再予以强调。

【项目说明】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江南八旗驻防满文奏折整理、翻译与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LSB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代军制中的驻防八旗与绿营互动关系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YJC770032。

（作者王刚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邮编 210093）

（责任编辑 赵增越）

^① 朱批奏折，西安将军徐錕奏请拨款生息作为八旗生童延师月课各费事，道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档号：04-01-35-0949-048。

^② （清）长善等：《驻粤八旗志》卷3《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859册，第702页。

^③ 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前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